

第
四
十
八
輯

老照片

我在东北四年(下) 何 方
献给三线的青春 李南央
“钻石”是怎样炼成的 何 蜀
幸福,被地震埋葬 刘光生
我的老照片收藏之路 徐宗懋
四合院里的家事 曹立先
萨镇冰赠石克士的一张照片 李 俨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照片.第48辑 / 山东画报出版社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8

ISBN 7-80713-394-5

I . 老... II . 山... III . 世界史—史料 IV . K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4769 号

书 名: 老照片(第48辑)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850 × 1168毫米) 5印张 97幅照片 100千字

印 数: 1-25000

定 价: 8.50元



晚清的烟民

方霖 供稿



桥上的少女（摄于20世纪40年代）

高建中 供稿



“眉来眼去”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摄于1947年。



194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





1947年5月2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左一)乘火车抵达南京，蒋经国(右三)等前往迎接。

目 录

- 何 方 我在东北四年(下)1
- 李南央 献给三线的青春30
作者对九年“三线”生涯的回顾——无论是知识的获取，还是人生的历练，都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 何 蜀 “钻石”是怎样炼成的53
- 刘光生 幸福，被地震埋葬65
一个饱受“人祸”磨难的家庭，在离粉碎“四人帮”仅仅还差七十一天，即将看到曙光时，却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天灾”……
- 徐宗懋 我的老照片收藏之路79
好的历史照片能带来新的历史视野，催生新的历史论述，使社会变得更有智慧……
- 徐义亨 想起姑妈97
- 崔媛华 母亲的一家102
- 王仁农 妈妈，您在哪里？108
- 曹立先 四合院里的家事114
- 鲁 人 祖上123
- 娄玉平 娘家的故事126
- 梁守泰 祖母的老照片132
- 李 俨 萨镇冰赠石克士的一张照片134

老照片

徐实曾 吉光片羽忆校长……………137

作者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有幸与郭影秋
校长零距离接触,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王威琦 “华北革大”剪影……………140

孙永胜 创办“五七”大学的日子……………142

潘玉仓 难忘受日本欺压的年代……………147

王木南 祖父拍摄的老照片……………150

清末民初,河北保定一带的社会风貌……

冯克力 为了“告别”的聚会……………157

《老照片》丛书

出 版 人

刘传喜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技术编辑

张 涛

封二 晚清的烟民(方霖) 封三 桥上的少女
(高建中)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
品,须经本社同意。

· 旧事重溫 ·

我在东北四年（下）

何 方 口述 邢小群 整理

两项“业余”工作

在双城期间，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主要工作以外，头半年还有两件事值得说说。

一是我参加做了点遣返日本人回国的工作。

伪满时期，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有好几十万。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大半是山，因此看上了东北的肥沃土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日本图谋永远占领东北的野心。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把日本人中的青壮年都抓走了，老、弱、病、残、女人、小孩儿，他们不要，就留下来。我们土改工作队有个任务，就是协助遣返这些人，把他们送回日本去。要求他们在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得留下，连戒指也不能带走。东北局分工李立三管这个事。在双城，像这样的日本移民很多。我们先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分别集中在东北人住的大房子里。双城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比较深，住的房子两面都是炕，一家男女老少都住在大筒间房子里，每对夫妻和小孩只用一个箱子或柜子隔开，炕的前面挂上布帘，中间有一条通道。大户人家的大炕可以住好几十人。我们工作队都得从俗，也是不分男女老少，和房主人一家住在用布帘隔开的对面炕上，开始时实在感到别扭。被遣送的日本人更是只能住这种对面炕了。

我去视察的时候，进了屋子从中间一过，好家伙，两边齐刷刷跪着两大炕人，怪可怜的。我就告诉手下人说，算了，别惹他



图① 1947年，作者（左）和王兴华在东丰。

们了，要给他们吃饱饭，不准欺负人。那时候是吃大锅饭，高粱米有的是。我们吃高粱米，他们也吃高粱米，再好的也没了。

其实集中起来要管他们吃住，不但是个负担，而且我们自己还没站住脚，也管不了。所以开始好长时间都是由他们自谋生路。我在哈尔滨时，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女人在那儿卖香烟、摆小摊儿。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女人冬天也穿着“趿拉板”在那儿叫卖“刀巴古”，日本话“香烟”的发音和英文差不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社科院做日本问题研究工作的时候，常和日本学者说：我参与过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人，日本欺负我们那么多年，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把他们送回去了。这也成了我同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点小小的资本。

二是和在双城的苏联驻军打交道。

我到双城工作后有好几个月，苏联红军才撤走。这期间有很多事要和红军打交道。我在延安学的俄文这时还真派上了用场，使我们在工作上沾到不少便宜。一方面要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要

求，一方面对“哨达子”(士兵)的违法乱纪可以进行交涉或提出我们县委的要求。当时苏军驻在双城的大约只有一个排，头目记不清是个上尉还是中尉，反正我们还是按东北老百姓的叫法称他“狗皮蛋”。一来二往，我和这位“狗皮蛋”也搞熟了。政治上我们很谈得拢，都是要搞世界革命，要反美帝。所以他有时会主动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军火库，里面有枪支弹药，特别是黄色炸药。我知道后就立即报告县委，赶快派人处理。我第一次听说黄色炸药——梯恩梯、当量呀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但是这位“狗皮蛋”自己的纪律和作风就大成问题，往往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例如他就公然提出要给他找女人。我报告县委后，大家都觉得难办。经过反复研究，还是县委书记林诚的意见取得了大家的同意，就是秘密通过当地人给他找个妓女。伪满时期卖淫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双城的妓女就不少。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讲究一点灵活性，或者叫革命的功利主义。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有事去找这位“狗皮蛋”，看到他房子里有个中国女人。他见我一来，就对那个女的说了个中国字：“走！”那个女的也就离开了。要是谈起“老毛子”在东北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南下土改

南下工作团

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从防守转入进攻。到1947年夏天，我们已在南满解放了大片土地，陈云的南满分局也从临江搬到通化。新解放地区急需派干部去发动群众，在陈云的要求下，东北局决定从北满派四个土改工作团，其中有松江省的一个，南下听从南满分局调遣。松江这个工作团，需要五六个对发动群众和土改工作有经验的县级干部，每人再自带一个工作队。当时抽调的有呼兰县委书记项军、



图② 1948年元旦在通化。

巴彦县长王兴华等和我一共六人，加上工作队员大概不到一百人。我有了上次在太平庄演习的经验，挑选的工作队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没带一个知识分子。全团集中后，1947年7月就从哈尔滨出发了。这次南下是一半坐火车，一半步行。因为到了图们，铁路就不通了，只能沿着长白山行军。走路自然有点累，但整天出没在大森林中也蛮有趣。东北夏天的气候本来就不热

(我在哈尔滨和双城的时候，很少见到人们用扇子，顶多用个蝇刷子赶苍蝇。而冬天却是零下40度。我的一个抗大同学西虹有一本描写“三下江南”的小说，书名就叫《零下40度》)，走在参天密林里更加凉爽。一路说说笑笑，走了十多天就到了通化。

通化是个中等城市，溥仪就是在那里临上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军抓住的。我们在通化休息了两天，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丰盛的欢迎会，第一次喝到以野葡萄做原料的通化葡萄酒，几乎喝醉。那时南满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获得解放，陈云抓的主要工作已从军事斗争转为土改了。因此他需要一个由他直接掌握的工作团供他做试点。我们这个团中有些人正是他任北满分局书记时，进行“反奸清算”试点用过的熟人，所以这时他又想让我们团起点类似的作用，以至于在工作上，我们和

辽东省委(当时书记是白坚)的联系反倒不如和分局密切。省委可能知道这种情况,也就不大多管我们了。分局和省委商定,我们团的工作地区为东丰县。因为通化附近的柳河、海龙等县,我们到来之前省委就已派工作团去了。

到东丰后,原来的县委归工作团领导。工作团主管全县一切工作,但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我作为团委委员兼工作队长,率领由双城带来的工作队,承包县城以北仁合、双庙子等区。再往北的黄泥河子还由土匪盘踞。由于是试点单位,所以允许并鼓励发明创造。这一时期,无论是上面吹风,还是传媒介绍的各地经验,都有越来越“左”的倾向,例如中央(留在陕北)和中央工委(派驻河北)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包括房屋、粮食、农具和其他浮财;关于农民运动自发性的议论;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一切通过贫农团或贫雇农占统治地位的农会等。在此期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无论是在土地问题还是在对待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问题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左”的倾向。再加上各地的加码,解放区掀起了一阵极左潮流,如土改中的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和部分工商业,过分偏重于挖浮财(北满称为“扫堂子”)等;在干部中的“搬石头”(指一些干部是阻碍运动的石头,应搬掉)、“三查”、“三整”,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而且各种“左”的言论和做法还相互传播、相互借鉴,遂使“左”的风气越刮越旺。1948年初,党中央对土改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可惜并不彻底。建国后的土改中,仍然犯有一些“左”的错误。

我们在东丰的土改,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大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完成了土改,建立了政权。但是自己检讨起来,还是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试验群众的自发性。本来这是以前学马列时被明确否定了的问题,但是我这时不知为什么头脑发昏,听说毛主席并不反对自发性,而且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根据,于是就自作

主张地进行试验了。具体做法是，我们在这个村子搞土改，附近几个村子我们不管，让群众自己去搞。后来一检查，搞得一塌糊涂。因为首先起来出头干的就是那些平时不务正业的勇敢分子，也就是在南方被叫做“痞子”的人。他们胡来一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策。不但地主富农吓个半死，由他们瞎折腾，还尽量巴结或者收买他们，中农也不敢做声，老实巴交的贫雇农也离他们远远的。所以试验不久就承认失败了，还得由工作队从头来，而且成了“夹生饭”，更难搞了。

二是根据中央工委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和一切通过贫农团的指示精神，接受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两次公开批评。这个口号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已经弄不清了，但确实在南满盛行了一阵。当时的辽东省委书记白坚和辽南省委书记林一山等，在东北局的会议上向陈云发难。印象深的有两点。一个是说他在临江时过分强调困难，把我们的处境形容为“风雨飘摇中的豆油灯”，批评他犯了悲观主义的错误。另一个就是土改中的“左”倾，包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据当时传达，陈云作了上纲很高的自我批评，但也反过来批评了白坚等人；高岗最后作结论时更是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三是在土改中打人的问题。当时形成了一股风：土改必须一再開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斗争会上往往发生打人的事，使打人成了普遍现象，特别是为了挖他们的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当时打人的“理论”是，为了平民愤，打下恶霸地主的威风，特别要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防止地富翻天，动员贫雇农参军。

但总的说来，我们工作团掌握的还比较稳，打人的事避免不了，但还没听说有打死人的事。为此，最近我还专门询问了当年的工作队员、现为北京重型电机厂离休干部的门荣升，他肯定没打死过人。我是不愿意看到打人的，并认为打人残忍，但阶级斗争的弦使我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制止。特别是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



图③ 1948年1月，作者在通化。

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说就不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